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陈俞飞

2026年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首次正式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四个坚持”为核心要义，深刻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这一思想展现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与清晰的实践逻辑。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赓续发展与“明体”之道

理论逻辑回答的是思想“从何而来、何以成体系”的本体性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理论,关键在于它深刻揭示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是什么、为什么”的根本道理。

从理论渊源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真理沃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建党学说,确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使命、组织原则,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基石;列宁结合俄国革命与执政实践,进一步丰富发展建党理论。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先后形成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重大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在赓续传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大原则论断基础上实现的创新发展。与此同时,这一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政者,正也”“修身立德”的为政之道,“令行禁止、上下一同心”的治理智慧,都为其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的一系列原创性重大概念,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又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从体系结构看,“四个坚持”构成了逻辑严密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呈现出“总—分—总”的清晰结构。前四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根本性重大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共同构成不可动摇的逻辑起点,“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明确战略方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确立价值追求。第五至第十三个坚持是分论,分别阐述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最后一个坚持——“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逻辑归结,强调了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建立刚性约束。综观之,“四个坚持”从“根本保证—基本方针—整体布局—战略闭环”四个方面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共同铸就习近平党建思想宏阔而精微的科学体系。

从核心命题看,理论逻辑的深刻性集中体现为对“两个答案”的规律性揭示。延安时期,毛泽东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

案。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人民监督是“外在良方”,自我革命是“内在妙方”,二者形成内外结合、双向发力的治理逻辑。“四个坚持”正是将这两个答案转化为系统完备的制度安排和行动纲领,实现了从价值理念到制度体系的逻辑升华。

二、实践逻辑: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凝练与“达用”之径

实践逻辑回答的是思想“向何处去、如何落地”的实践性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是书斋里的理论,而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从实践生成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系统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十余载坚持不懈的管党治党实践,直面并破解诸多深层次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对这一系列实践成果的系统梳理、规律提炼与理论升华。

从实践指向看,“四个坚持”具有清晰的行动指南功能。它不是抽象的理论教条,而是可以直接转化为实践操作的行动纲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要求全党把理论学习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要求打通从中央到基层的“经脉”;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求选贤任能、锻造栋梁;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求好作风不能“一阵风”;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要求纪律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求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要求靠制度办事、照章行事;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求谁的地盘谁负责。每一个“坚持”都对应着具体的实践要求和工作部署,构成了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完整“施工图”。

从实践成效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已经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根本性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每向前推进一步,都对党从全面从严治党之路主要有东部的广州(番禺)和西部的徐闻、合浦(古时属广东)两大发祥地。

二、洗夫人“丝路”的起源与发展

洗夫人的丝路起源追溯到秦汉时期。秦汉时期,在广州以西至桂东南百粤民族的西瓯、骆越族是洗夫人的臣族。西瓯、骆越族可能当时就与东南亚各国发生来往,初步形成海上丝路。到了东汉后,西瓯、骆越族演变为南越俚僚等族,俚族人多是在沿海一带聚居。据《越绝书》载:“越人(俚人是其一个支族)水行而山处,陆事寡而水事众,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以捕鱼打猎为生。因此船成为他们的生产、生活的主要工具,造船技术很早发明,也很发达。起初是制造独木舟,在电白、化州出土大批独木舟就是明证。到洗夫人时代也能制造50、60吨的大木船铜船。这些船不仅是为了打鱼,更主要是到邻国港口进行商业贸易。当时高凉地区冼氏家族常到南海(今广州)做生意,还到东南

终紧跟实践发展步伐。

三、“体用贯通”: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党建思想最鲜明的理论品格,正在于“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体”就是阐明根本道理、揭示本质规律;“达用”就是解决现实问题、指导具体实践;“体用贯通”则是实现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价值逻辑与治理逻辑、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有机统一。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它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又以创新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首先体现在“四个坚持”的内在结构之中。理论逻辑确立了“建设什么样的党”的价值坐标——从党的领导是本质特征到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从全面从严治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构建起党的建设的价值框架和原则体系。实践逻辑回答了“怎样建设党”的路径方法——从政治建设统领到思想凝心铸魂,从组织体系建设到干部队伍建设,从作风纪律建设到反腐败斗争,再到制度治党和“责任落实,每一个坚持都是可操作、可检验的具体实践要求。“四个坚持”贯通政治逻辑、治党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理论为实践提供方向,实践为理论提供验证,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还深刻体现在“两个答案”到“四个坚持”的历史演进之中。“两个答案”是价值层面的方向指引,“四个坚持”则是将这些原则转化为可操作、可执行、可检验的制度安排和行动指南。“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国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又回答了“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了从问题到答案、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闭环。

四、结语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科学体系,其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理论逻辑为这一思想提供了深厚的学理根基——它深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真理沃土,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以“四个坚持”构建起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实践逻辑为这一思想赋予了强劲的行动伟力——它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以清晰的实践指向和显著的实践成效彰显出强大的真理力量。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其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内在统一,对于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单位: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从“两个答案”到“四个坚持”: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历史逻辑与时代贡献

马玲

2026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其明确定位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这一思想以“四个坚持”为核心要义,深刻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从延安窑洞的“第一个答案”到新时代的“第二个答案”,再到“四个坚持”的完整理论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承载着百年大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刻探索,蕴含着清晰的历史逻辑和深远的时代贡献。

一、第一个答案:延安“窑洞对”的历史开创

1945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民主人士黄炎培应邀访问延安。在毛泽东的窑洞里,黄炎培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这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从容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便是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给出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成为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这一答案的本质,是将政权的生命力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以人民民主的外在约束确保权力正确行使。人民监督是“外在良方”,是祛病除疴的他律力量。

“第一个答案”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坚守。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正是将这一根本原则转化为政权运行的制度逻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就对长期执政规律进行了深邃思考。

二、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的历史性突破

跨越七十余年时光,“窑洞之问”始终萦绕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头。2021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重提延安“窑洞之问”,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这是认识论上的重大飞跃。人民监督强调外在约束,自我革命则强调内在自觉。发扬人民民主和实施人民监督属于他律,相当于“外科手术”;自我革命属于自律,相当于“内部调理”。两者目标一致、内在统一,都源

自党的初心使命。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决定了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谋私利就有了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第二个答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这一回答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刀向刀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的坚定决心和历史主动。

三、“四个坚持”:“两个答案”的制度化表达

如果说“两个答案”是价值层面的方向指引,那么“四个坚持”就是将这两个答案转化为制度安排和行动纲领的系统工程。“两个答案”回答了“为什么”和“靠什么”跳出历史周期率,“四个坚持”则系统回答了“怎么办、怎么干”——从价值追求到制度闭环,构成了完整的逻辑链条。

纵观“四个坚持”的整体框架,处处贯穿着“两个答案”的精神内核。

人民监督的精神内核,集中体现为“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一坚持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价值追求转化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永恒课题——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人民监督的外在约束,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内在自觉,共同构成了党与人民关系的完整闭环。

自我革命的精神内核,则贯穿于“四个坚持”的多个层面。“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自我革命的战略方针,以“严”的主基调确保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自我革命的关键抓手,构建起惩、治、防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是自我革命的重要保障,以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以好作风凝聚党心民心;“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自我革命的制度保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从逻辑结构看,“四个坚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前四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第五至第十三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最后一个坚持也是管总的,是有力保障。“四个坚持”从“根本保证—基本方针—整体布局—战略闭环”四个方面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共同铸就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宏阔而精微的科学体系。

四、从历史到时代的逻辑升华

从“两个答案”到“四个坚持”,

这条历史线索清晰呈现了三个层面的逻辑升华:

从价值理念到制度体系的升华。“两个答案”是原则性的方向指引,“四个坚持”则是将这些原则转化为可操作、可执行、可检验的制度安排和行动指南。“四个坚持”立足政党、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涵盖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政治方向、战略方针、内生动力、工作布局、政治责任,构成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从“破题”到“答题”的升华。“窑洞之问”是问题的提出,“两个答案”是方向的明确,“四个坚持”则是系统完整的解决方案。“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国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又回答了“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了一个从问题到答案、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闭环。

从历史自觉到理论自觉的升华。“两个答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自觉,“四个坚持”则将这种历史自觉上升为系统完备的理论自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五、结语

20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走过百余年奋斗历程,我们党始终在思考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从延安窑洞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到新时代的“党的自我革命”,再到“四个坚持”的完整理论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承载着百年大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刻探索,蕴含着清晰的历史逻辑和深远的时代贡献。

人民监督是“外在良方”,自我革命是“内在免疫”。“四个坚持”则将两者有机统一,构建起从价值追求到制度安排、从原则确立到任务部署再到责任落实的完整链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正式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从“两个答案”到“四个坚持”的历史逻辑,对于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本文系2026年度茂名市科技计划立项项目: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院校“科普+思政”协同育人的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26688)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

论洗夫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及“一带一路”对其传承与发展(上)

郑显国

洗夫人海上丝绸之路是对我国西汉以前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承和发展,它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积极传承,创造海洋经济建设的新辉煌。

一、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丝绸之路的定义和内涵,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是:“中国古代经中亚通行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绸和纺织品等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实际上,“丝绸之路”只是对两千多年来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统称。

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西方早就已有中国向其出口丝绸的记载。可见,在汉武帝真正将丝绸之官方化的百年前,中国的丝绸早已传至西方,这为张骞的西域“凿空之旅”奠定了基础。据《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派黄门译长开创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水陆联运的潇水至贺江古道到广信再沿南江、北流江、南流江到达徐闻出海连接海丝,形成官方化正式的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自西汉正式形成后,到唐宋时期达到鼎盛,鸦片战争前的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壮大。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可分为三大航线:1、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朝鲜、日本。2、

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东南亚诸国。从《汉书·地理志下》的记载明白看出,西汉时期我国东南亚一带,已经开展海上交通和商业贸易。3、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直至拉美。《汉书·地理志》的海上航线就有南海与印度洋的航线。古时,在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部的广州(番禺)和西部的徐闻、合浦(古时属广东)两大发祥地。

二、洗夫人“丝路”的起源与发展

洗夫人的丝路起源追溯到秦汉时期。秦汉时期,在广州以西至桂东南百粤民族的西瓯、骆越族是洗夫人的臣族。西瓯、骆越族可能当时就与东南亚各国发生来往,初步形成海上丝路。到了东汉后,西瓯、骆越族演变为南越俚僚等族,俚族人多是在沿海一带聚居。据《越绝书》载:“越人(俚人是其一个支族)水行而山处,陆事寡而水事众,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以捕鱼打猎为生。因此船成为他们的生产、生活的主要工具,造船技术很早发明,也很发达。起初是制造独木舟,在电白、化州出土大批独木舟就是明证。到洗夫人时代也能制造50、60吨的大木船铜船。这些船不仅是为了打鱼,更主要是到邻国港口进行商业贸易。当时高凉地区冼氏家族常到南海(今广州)做生意,还到东南

亚一带互商。虽然目前还没有洗夫人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记载,但从相关的历史记载和世代口碑流传,就可证明南朝洗夫人时代的确已有大规模的海丝活动。

(一)据《梁书·王僧孺传》(卷三十三)记载:“天监初……寻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船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此记载明白告诉我们,南梁时王僧孺出任南海郡(广州)太守,那时经常有高凉地区的奴隶被贩卖到南海郡。汉代以来形成的高凉概念就是东从恩平,西至化州、吴川一带的大高凉概念。那时高凉一带是奴隶制社会,成为出口奴隶的基地。奴隶被贩到南海再贩运到国外。这是洗夫人成为首领以前的情况,洗夫人执政后废除了奴隶制。记载还说明每年都有几次外国商船到南海和高凉来,进行商品买卖。这足以证明在南朝的梁代高凉一带已有发达的海上船舶运输,以及对外贸易活动。洗夫人成为首领后,这种海上贸易不但不会停滞,反而会更加发展。至于从高凉运奴隶到广州是从高凉哪里出航的呢,具备海港航行条件的只有蓬头、博贺、水东和阳江。而蓬头是在洗夫人大本营门前,无疑是从蓬头出发的。

(二)从《隋书·洗夫人》记载:“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献于陈主。”可推出洗夫人时代高凉与东南亚的海上丝

路的互通贸易关系。扶南国是公元六世纪东南亚比较强大的国家,地域包括泰国东南部、柬埔寨、老挝南部和越南南部。洗夫人所得的犀杖有几种可能:一是扶南国使者到高凉献给洗夫人的;二是洗夫人派互商的人在扶南国购买或者扶南国赠送的;三是扶南商人在高凉贸易时为洗夫人购买的。但不可能是哪一种情况,都有力证明洗夫人的海上丝路到达了东南亚一带。据王元林所著的《海陆古道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说:“梁时,林邑曾九次派使节入梁,扶南也曾八次遣使入梁”,其他东南亚各国以及天竺国和狮子国(印度)等也分别遣使与梁朝往来(见《梁书·南蛮诸国传》卷五十四)。这些国家与梁朝的互动,不只是外交来往,更重要的是通过海上互通贸易。这些国家出使梁朝,是乘大船先到岭南广州及岭南擎天柱圣母洗夫人的高凉的。高凉的蚕丝、陶瓷等物产源源运往东南亚等国。可见,洗夫人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活跃是真实的。

(三)据日人小叶田《海南岛史》载:“冯若芳为万安州大首领,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既夺其货,又掠人为奴隶。奴婢所居村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从此记载可看出冯若芳势力之大,是个大海盗。他能劫外国船,证明他有庞大的大船队,既当海盗又在海上经商。他与同期的

振洲临振那别驾冯崇债同是洗夫人后裔,冯智戴的孙辈,唐天宝期间为海南风云人物。他们在唐中期能再兴起,全赖于洗夫人为他们创下的基业。洗夫人被隋称为嫺国夫人,赠临振县(三亚)为“汤沐邑”(食邑),洗夫人少不了要到这些地方巡视,派人到这里管理,都靠船队过海。当时,洗氏的船队不但不是为了管理海南,更大程度上是以临振为基地发展了南海的丝路贸易。这些大家业后来又为冯崇债、冯若芳所继承。

(四)历代民间口碑传说为洗夫人的海上丝路提供佐证。电城及山兜一带流传下来的口碑:传说在南朝时,山兜丁村门前就是港湾,当时小船都是在此出海的,大船要在莲头出发。洗氏俚人为了纪念船的功劳,曾在与丁村相邻的湿水村旁的湿水陂头凿建了10多米长的大石船为图腾纪念。可惜的是在农业学大寨时此石船被炸掉了,现在遗迹尚存。传说不是虚无,而是民间长期流传下来对过去的事实 的记述和评说,是有事实基础的。因此,山兜丁村的口碑流传是可信的。传说当年洗夫人就是从丁村出发,在莲头港登大船到海南去的,她一生多次到过海南平乱、管理。结合正史《隋书》、《北史》的“洗夫人传”说她巡视岭南十余州,当然包括海南岛的州,从此可证口碑传说是可靠的。

据茂名市政协原文史委办公室主任杨瀚波说,越南一个历史学者曾对他说过越南有不少洗夫人庙,并说当年洗夫人应越南请求出兵越南打败了邻国的象队,使越南转危为安的故事。作为历史学者所说的故事不会是杜撰而是有史实根据的。洗夫人时代的越南邻国主要是扶南国。不过,洗夫人当时出兵越南不是国与国的事,而是同一国家反抗外来侵略的问题,是保卫同胞的正义之举。因为,南朝时,今越南北部是中国版图,是属于交州(交趾郡)地域(交州辖四郡),大交趾郡的民众与洗夫人同属俚族。当时洗氏家族与交趾来往密切,出兵交趾(今越南),同样是出动大批船队去的,既快速又舒适。如果从陆路走,时间长又辛苦不可取。我想,除了此次军事行动,平时,洗夫人与交趾也是有商贸来往的,这就形成了高凉、海南与交趾的北部湾海上丝路。

可见相关历史记载与口碑传说从间接角度证明洗夫人时代高凉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是真实的,这与俚人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水事众”的特性相适相通。洗夫人在海上丝路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未完待续)

(作者系广东省洗夫人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茂名市政协文史专员、茂名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研究员)